

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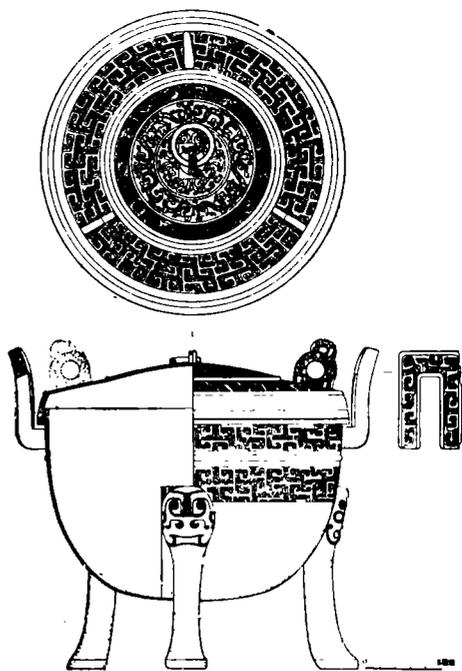
韩 伟 曹明檀

1977年9月陕西凤翔纸坊公社高王寺大队发现一处窖藏，距地面2米左右，窖内有十二件铜器。经勘查得知，窖藏地点在秦都雍城范围内的马家庄宫殿区附近。该地有灰坑多处，地面散布春秋战国秦的绳纹瓦。出土铜器有：

鼎 三件。形制大体相同，花纹与大小稍异，其中较大与较小的两件已残破。完整的鼎通高21.6、口径19.7、腹深25.4厘米。鼎均为附耳，子母口，圜底，深腹，蹄足，盖上有“8”形纽三枚，盖的中心有环。完整的鼎的盖面有四个大小递增的同心圆环。最外的圆环内侧，有凸弦纹一周，并饰云雷纹。其余三同心圆环饰凤鸟纹与夔龙纹。该鼎腹、耳部亦饰云雷纹，足之根部饰兽面纹（图版陆：1；图一）。鼎内底铸“吴王孙无土之脰鼎”八字（图版陆：2）。“脰”字屡见于寿县楚器铭文，依朱德熙、裘锡圭解，应为“厨”字^①。吴王孙无土之饮食器亦自名“脰”鼎，可见吴人与楚人均使用此字。无土鼎与寿县蔡侯墓，洛阳中州路（西工段）出土之鼎，均有相似之处。吴自寿梦称王，始见于史书。“始封君”为寿梦，其子辈诸樊、余昧、余夷，孙辈僚、阖廬，重孙夫差，均称吴王，传七王而国灭。亡国后裔当不能仍称“吴王孙”，故此无土可能与阖廬或夫差同辈。因其父未称吴王，故不用吴王子而冠以“吴王孙”的称谓，以示身份显赫。这与鼎属春秋晚期亦吻合。无土不见经传，此鼎

发现可补史阙。

盖豆 一件。通高21.6、盘径18、腹深19.6厘米。子母口，口沿略向外折，曲颈。盘、盖呈盒形，盖有圆形盘状捉手。豆柄长而中空，喇叭形圈足，盖及腹上部均饰蟠螭纹，圆捉手及圈足上饰简化夔龙纹。豆盘口沿下有对称的环耳一组（图版柒：1；图二：5）。这种形制的盖豆，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，如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村的镶嵌狩猎纹豆。高王寺盖豆与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、山



图一 铜鼎

彭镇1号墓、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的铜豆亦相似^②。长治分水岭126墓断代较笼统，但有铜两件出^③，时代应属战国早期。高王寺盖豆的时代亦应在战国早期。

镶嵌射宴壶 二件。形制雷同，纹饰略异。通高40、口径10.8、腹径23、足高3.4厘米。小口，长颈，斜肩，深腹，平底，圈足。肩上有兽面衔环一对。有盖，盖面微鼓，中心刻有涡纹，四周有异兽纹，周边有鸭形纽三个（图版陆：3）。壶身上用金属片镶嵌

出各种图像，且以带状斜角云雷纹将壶身隔为四层（图版陆：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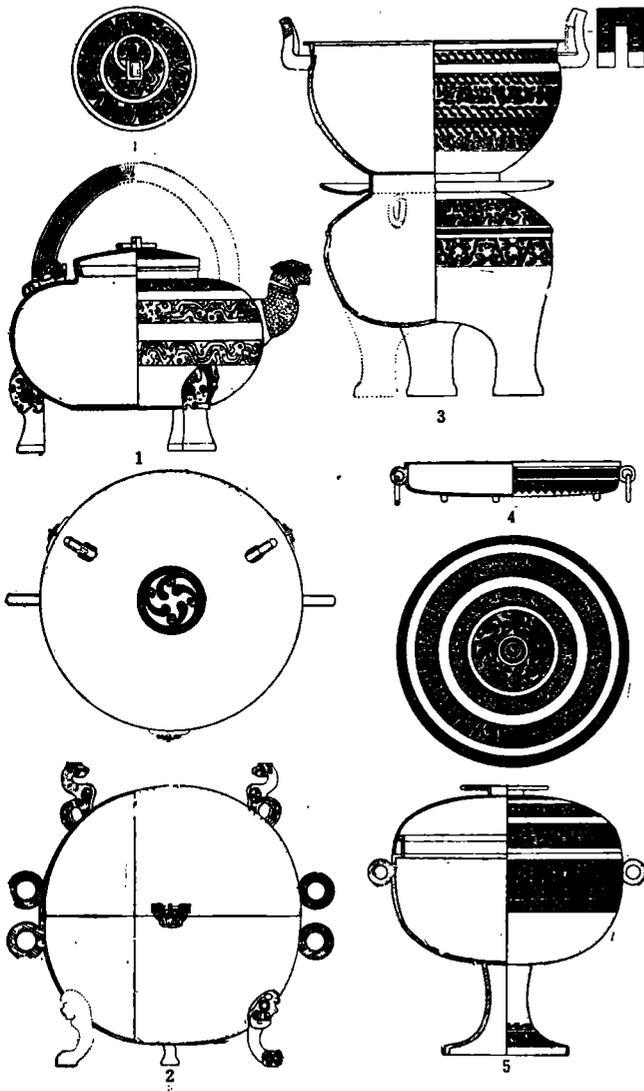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层为习射图三组，倒刻于壶的颈部。第二层为弋射图三组。第三层为宴乐图三幅，还有一小段宴乐图作为填空补刻的。第四层为狩猎图。

此壶接近洛阳中州路2717号及山彪镇1号墓的铜壶，与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所出的镶嵌图像铜壶雷同^④。因此，高王寺镶嵌射宴铜壶应属战国早期的器物。

敦 二件。较大的通高24.2、腹径20.8、腹深10.4厘米。较小的通高23.8、腹径20.2、腹深9.5厘米。敦体呈圆球状。大敦之半球形器盖上有昂首挺胸的三兽，小敦盖上有三兽形成的三环纽，两敦的盖顶中心部位均有一圆形涡纹图案，上下器口均平直。大敦器盖口沿有三个铺首形成的三牙，小敦器盖口沿有素面的椭圆形三牙，使上下扣合紧密。敦底均有三蹄足，足之根部饰兽面纹。腹部有相对的两组环纽，分别饰绚纹或平行线纹（图版柒：2；图二：2）。此类敦在楚国地区颇为流行。《长沙发掘报告》中图版拾贰之3的敦与此敦相似，其时代应在战国中期以前。

盘 一件。通高6.5、盘径34.8、腹深5.1厘米。直口，唇外折，平底，三矮足。口沿下有对称的两组凹纹环耳，其中一组衔环，这种形制的盘不多见。腹部饰变形蟠螭纹两周，中隔绚纹一周，下为简化蝉羽纹（图版柒：4；图二：4）。从纹饰看，与同出的盖豆作风一样，所以，时代也属战国早期。

匜 一件。通高10、腹深6.25、流长6.4厘米。胎质薄，器表素净，平底，深腹，长流。流内篆刻水波



图二

1. 铜提梁壶 2. 铜敦 3. 铜匜 4. 铜盘 5. 铜盖豆

与鱼纹，匝后有环形纽一（图版柒：4）。这种细如发丝的线刻纹饰，见于辉县出土的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。因此，该器时代也应在战国早期。

提梁盃 一件。通高22.9、口径10、腹深11.2厘米。直口折唇，鼓腹，肩、腹部饰双头兽纹三周。平底，有兽面蹄足三枚。带环纽的圆盖面微鼓，饰蟠虺纹。以兽首为盃流，兽身及其四足为盃之提梁，造型优美，惜已残断（图版柒：3；图二：1）。提梁盃与长治分水岭36号墓所出的铜盃基本相同^④。只是此盃流为兽首，长治盃为凤头。与长治36号墓的盃同出的还有形似鼎的鬲（或称为敦），在凤翔地区的战国早期墓中曾有发现。因此，这件提梁盃也属战国早期。

甗 一件。通高30.6、口径19、甗深10.6、鬲深12厘米。系甗鬲分体，中有围盘。甗窄沿束颈，有饰三角雷云纹的两附耳，下腹内收，甗底圆形算，算孔中心为十字形，其余为长条形孔，腹部饰蟠虺纹和绚纹。鬲，束口，直沿，圆腹，折肩，平裆，蹄足，肩部有环纽。腹部和肩部分别饰双头兽和变形环带纹。围盘置于甗腰，可转动，用于防止汤沸灭火（图版柒：5；图二：3）。此甗与山西原平出土的基本相同，纹饰也类似^⑤。此甗之鬲的形制多见于战国早期以前，如寿县蔡侯墓、洛阳中州路、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鬲，时代也在战国早期。

据以上分析，这批铜器窖藏时间当在战国中期以前。此时秦都雍城未有重大的社会变动，窖藏原因尚待考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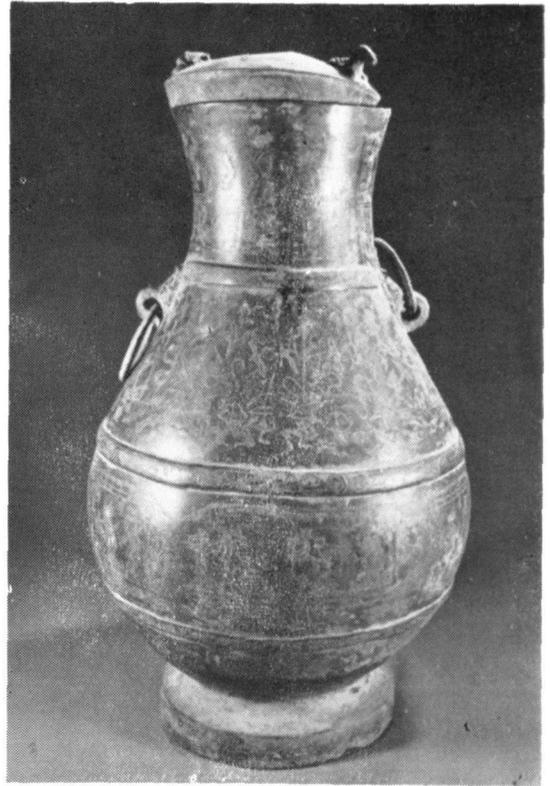
窖藏中除了秦器外，无土脰鼎为吴器，敦为楚器，豆、壶等器则与中原作风完全一致，反映了秦国与吴楚及中原诸国的密切关系。尤其是有铭文的吴器在陕西出土，这很可能与吴楚战争有关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：秦曾出兵救楚，吴师兵败于军祥等地时，无土自用器为秦军俘获并被运回雍城亦有可能。所以，无土鼎在凤翔出土，应是春秋晚期秦楚吴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见证。

铜壶上之建筑图样，提供了早期斗栱的重要资料。我国的早期斗栱，主要见于辉县出土的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（《辉县发掘报告》第三编，赵固村）、故宫博物院的宴乐铜壶以及成都百花潭出土的铜壶上的建筑图样。然而，由于这些图样的斗栱结构模糊，给探讨汉代以前的斗栱及其发展带来一定困难。凤翔高王寺镶嵌射宴纹铜壶上之迴廊前檐柱头上，有方形平盘式的榑斗，这可能是迄今见到的最早的榑斗形象。该斗之斗身与斗欹尚未有明显界限，栱与升亦无区别，仍属实叠栱，这表明了斗栱的原始形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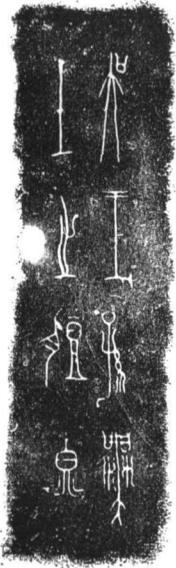
- ① 《战国文字研究（六种）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2年第1期。
- ② 《山彪镇与琉璃阁》，《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第4期。
- ③ 《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》，《文物》1976年第3期。
- ④ 《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》，《考古》1984年第4期。
- ⑤ 《原平崤峪出土的东周铜器》，《文物》1972年第4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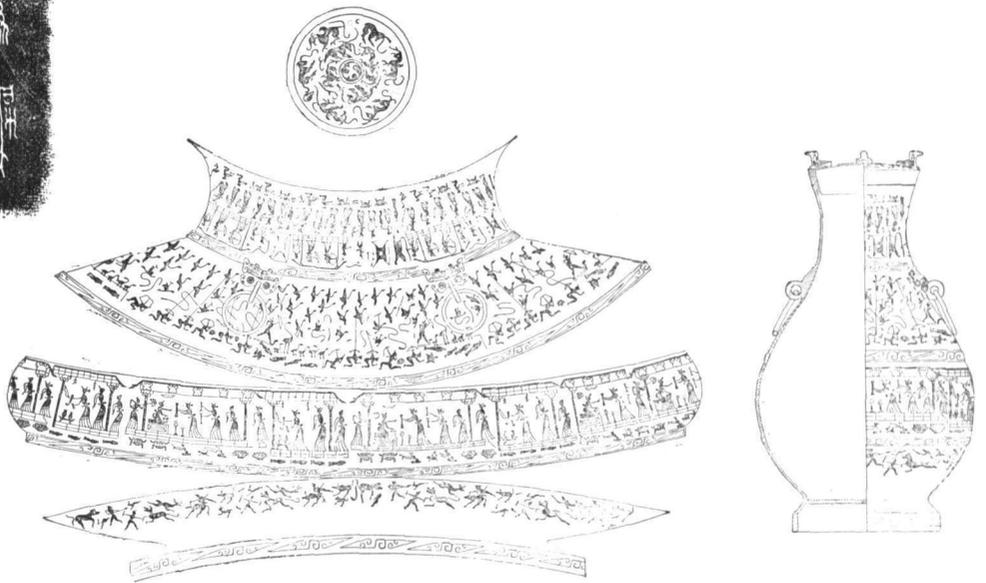
1 鼎



3 镶嵌射宴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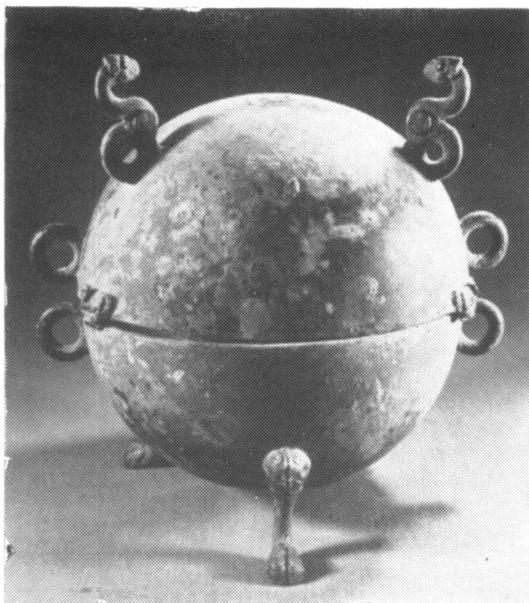
2 鼎铭文拓片



4 镶嵌射宴壶摹本及展示图



1 盖豆



2 敦



3 提梁盃



5 甗



4 盘、匜